

云南城市文化研究论丛

论丛主编 张永刚 副主编 王 炜

云南边疆城市的 文化构建

Yunnan Bianjiang Chengshi De
Wenhua Goujian

主 编 马继明
副主编 王 炜 高 兴

本书是云南城市文化研究基地组织的一项专项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云南一些主要城市在文化传承与发展实践中，如何找准定位，突出特色，避免雷同，塑造城市的文化个性。所论涉及昆明、曲靖、丽江、昭通、普洱、罗平、富源等地，并对云南主要城市的文化建设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概括，有利于提升云南边疆城市的文化品位，推进云南边疆城市化进程。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云南城市文化研究论丛

论丛主编 张永刚 副主编 王 炜

云南边疆城市的 文化构建

Yunnan Bianjiang Chengshi De
Wenhua Goujian

主 编 马继明

副主编 王 炜 高 兴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边疆城市的文化构建/马继明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3
(云南城市文化研究论丛/张永刚主编)
ISBN 978 - 7 - 5482 - 1422 - 9

I. ①云… II. ①马… III. ①城市文化—建设—云南
省—文集 IV. ①G127.7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1654 号

云南边疆城市的文化构建

主 编 马继明

副主编 王 炜 高 兴

策划编辑: 徐 曼

责任编辑: 徐 曼

责任校对: 范 娇

封面设计: 周 旸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研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40 千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1422 - 9

定 价: 40.00 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电 话: 0871 -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 - mail: market@ynup.com

序

在我们置身的时代，我想，可能没有什么会比城市更使我们爱恨交加了。斯宾格勒曾断言，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世界史就是人类的都市时代史，国家、政府、政治、宗教等，无不是从都市中发展起来并附着其上的。但是，都市的历史已经说明，都市的文化创造功能同它的文化负面影响似乎紧紧相连。约翰·里德在其《都市》一书中写道：都市被定义为文明的产物，但是它们也是危险的寄生物，能够祸害远离其边界的广大地区。人类所有的成就和失败，都微缩进它的物质和社会结构。回顾这些思想者敏锐的看法，可以促使我们对都市保持更持久的审慎的态度。都市，永远都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和仔细打理的所在。

没有人会否认 21 世纪是一个“都市的世纪”，这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说法。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在越来越多地依赖于都市所产生的活力。中国的情况尤为突出，这个由来已久的农业国度，已经搭上了都市化的快车。我们正在不断享受都市发展进程带来的种种令人欣喜的成果，与此同时也不断感受着都市的巨大威胁，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衰竭、地区发展失衡这些都市化通病，以及都市文化趋同、都市个性缺失等现象正在直接和间接地发出危险信号。可以说，展开对都市的思考，并促进更为科学的都市建设实践，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现实需要。

云南都市如何发展？在这个以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为主要特色的边疆地区，怎样从都市化进程中获得实惠，又有效避免都市化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些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应对这些问题需要开阔的思路和艰难的探索，但有一点是清晰而明确的，那就是应该始终将视点放在文化的整体效应之上，重视边疆都市的文化建构，不要重蹈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市化初始阶段那种只重经济不重文化从而导致都市发展失衡的覆辙，把云南边疆城

市建设成为民族文化繁荣、生态环境优越、区域发展协调、个性特色鲜明的城市。

刘易斯·芒福德认为：“把区域作为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现实来掌握，是迈向建设性的规划、居住和都市更新政策的第一步。”基于此种认识，云南城市的文化构建，应有鲜活的理念作为先导。笔者认为云南城市离不开“边疆”地缘，它们的文化不应是一般意义上的趋同的城市文化，还应该突出“历史意蕴”、“地缘特色”与“民族传统”。因此，将“美好的边疆城市，和谐的诗意生存”作为云南城市文化风格塑造的基本理念，落实在笔者带领的团队所承担的云南省校省院合作项目“云南城市文化风格塑造研究”中，对云南城市文化建构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作为这种研究的后续，我们通过曲靖师范学院的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城市文化研究基地”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工作，准备推出“云南城市文化研究论丛”系列丛书。马继明副教授主编的这本《云南边疆城市的文化构建》就是其中的一项成果。它既是有目的的城市文化研究的体现，又是实践教学活动的尝试。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的部分学生在导师的带领下，开展了云南城市的专项研究，研究涉及云南城市的多个领域。更难能可贵的是，研究每有新颖的思想亮点闪现，体现出明显的智慧色彩。马继明副教授等人将有关云南城市文化的论文修改整理，编辑成书，希望有助于云南迅速发展的城市化建设。当然，文化是一个宽泛而又捉摸不定的东西，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限于水平，我们的研究肯定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有待大家给予指导指正。但研究毕竟已经开始，沙里宁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而笔者希望的是，我们憧憬什么，就能在我们居住的城市里看到什么。关键是，城市正在行动，我们必须思想。

张永刚

2013年3月

目 录

论曲靖城市文化建设中“爨碑”的重要价值	薛 钰(1)
从曲靖城市雕塑看曲靖城市文化建设	雷瑶瑶(21)
论曲靖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古镇”元素	吴凤珍(37)
从城市文化的角度看曲靖的宜居性	赵风云(50)
论曲靖城市文化品质的提升	许骞予(61)
“宜居城市”曲靖的文化状态与文化发展	张金伟(72)
论地方高校在曲靖城市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方江瑞(86)
小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地方特色	
——以云南罗平为例	孙改艳(99)
罗平的城市文化发展现状及走向	方宝琼(113)
罗平布依文化在城市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方永斌(128)
罗平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定位研究	马永希(144)
关于富源小城市文化建设的思考	盛 琴(159)
从会泽小城市文化建设看会馆的主要作用	宋吉粉(173)
会泽城市文化定位研究	赵 梅(190)
对师宗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人文意识的探讨	王金芬(204)

云南边疆城市的文化构建

- 论元江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哈尼族文化元素 何 锐(218)
- 论云南寻甸旅游文化建设与城市文化发展的关系 王 艳(230)
- 论芒市的城市文化个性塑造 廖菊娣(241)
- 文化旅游在建水城市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李应兵(254)
- 普洱茶文化与普洱城市文化建设 高志丹(266)
- 论白族民居文化对大理城市文化建设的作用 胡阳阳(274)
- 论丽江古城的酒吧文化对城市及其文化的影响 吴 榕(288)
- 从昆明方言传承看昆明城市文化发展 张 杨(300)
- 论昭通作家群对昭通城市文化的影响 刘 静(310)

论曲靖城市文化建设中 “爨碑”的重要价值

薛 钰

引 言

据资料统计，“十一五”时期，云南省曲靖市经济综合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生产总值在全省第二个迈上千亿元台阶。2010年市内生产总值1005.5亿元，年均增长13.4%，人均生产总值17000元，城镇化率37%，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被评为“新中国建国60周年城市发展代表”。无疑，这是曲靖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然而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曲靖城市发展过程中诸多负面的问题也凸显出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爨碑”是曲靖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两通碑刻，分别是位于曲靖市的《爨宝子碑》和陆良县的《爨龙颜碑》，合称“二爨”。自其出土以来备受世人瞩目：云贵总督阮元称誉于前，维新领袖康有为盛赞于后，更有日本书道爱好者不远万里前来“朝圣”。作为曲靖本土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爨碑”蕴涵了丰富的文化艺术价值。但很遗憾的是，它的重要价值却始终没有在曲靖城市文化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曲靖城市文化发展与“爨碑”

（一）曲靖城市的历史与现状

曲靖是珠江的源头，也是著名的“爨文化”的发祥地。早在旧石器时代，南盘江流域一带就有人类生存的足迹。战国时代，楚国开拓疆域的著名事件“庄蹻入滇”拉开了曲靖地区原始开发的序幕。公元前225年，秦王修通了起自四川宜宾，终于云南曲靖的“五尺道”，有力地促进了云南边疆地区的开发。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将“滇国”划入王朝版图之

内，在曲靖一带建成了味县。公元 225 年，诸葛亮亲率大军征讨南中地区叛乱的部族，首领孟获与诸葛亮盟誓归附蜀汉。诸葛亮废益州郡设置建宁郡，并把统治机构迁往味县，味县成了南中地区政治、军事中心。此后，随着朝代的更迭，曲靖地区先后被称为宁州、南宁州、朗州、石城、南宁、曲靖。^①

改革开放 30 余年来，曲靖城市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今是仅次于昆明的云南第二大城市，分别于 2005、2006、2008 年三次被评为“中国十佳宜居城市”，GDP 保持高速增长，连续数年排名全省第二，“到 2015 年，曲靖城市建成面积将突破 100 平方公里，人口达 100 万以上，成为云南的第二个百万人口大城市。到 2020 年曲靖中心城区面积将突破 200 平方公里成为云南第二个特大城市”^②。

（二）城市与城市文化

正在扩张的城市规模、经济发展、城市品牌为曲靖市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城市物质文明的繁荣也在召唤着城市文化构建。城市文化是依托城市这一物质实体而存在的，没有城市就没有城市文化。就“城市”而言，无论是传统的中国式的城市，还是西方城邦、城堡式的城市，大多同时具有“城”的功能和“市”的功能。城，主要为居民提供生存、居住的场所和相关基础设施以及具备必要的军事防卫功能；市，主要满足居民的生活，提供必要的商品经济贸易平台。作为一种较高级的聚落形式，“城市自出现之日起就不仅是经济聚集地，而且是人类文明的集中地，是历史文化资源相对丰富的社会区域”^③。马克思认为，城市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分工的需要。如“城市化”这一概念是就在工业革命之后逐渐走上历史舞台的，它指的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向城镇、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城市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城市文化，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城市文化，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共同思想、价值观念、基本信念、城市精神、行为规范等

① 百度百科：《曲靖》，<http://baike.baidu.com/view/20524.htm>。2012-4-29。

② 百度百科：《曲靖》，<http://baike.baidu.com/view/20524.htm>。2012-4-29。

③ 卞敏：《城市文化与地域文化》，载《阅江学刊》2011 年第 2 期，第 40 页。

精神财富。”^① 我们常说的“城市文化”指的是后者。城市文化的基本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物质文化层，它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切成果和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的总和；第二层次为行为文化层，它是人的行为在城市文化中的体现，承载着城市特有的文化信息；第三层次为精神文化层，它是人们社会意识的总和，是城市文化的最高境界，最能体现城市文化的特征。”^②

近年，城市文化这一概念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据统计，2011年12月，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50%。我国城市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然而遗憾的是，城市物质文明的膨胀使得更多问题也凸显出来，诸如住房危机、交通拥堵、能源短缺、资源紧张、城市规划不合理、城市建设趋同等问题都使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面临巨大挑战。追根溯源，是属于我们每一个市民的“城市精神”缺失了。正如张旭敏先生所说，“经济是城市的肌体，政治是城市的血脉，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文化是自然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结合，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是一个城市生存的基础和城市人生活的精神支柱。也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③。

城市文化的发展水平是现代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提升现代城市形象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核心。对我国而言，城市文化的探索还具有特殊的意义：“不管是中华文化或是区域文化，事实上都是以城市文化为中心，如中华文化离不开古都、古城，海派文化离不开上海，京派文化离不开北京，岭南文化离不开广州，巴蜀文化离不开重庆、成都，吴越文化离不开苏州、绍兴等。”^④

（三）曲靖城市文化建设的现状与“爨碑”

目前，我国城市定位方面存在很多不良的倾向：城市定位贪大求全、

① 张伟：《谈城市文化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载《山西建筑》2008年第18期，第68页。

② 张旭敏：《论城市文化中的几个问题》，载《南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25页。

③ 张旭敏：《论城市文化中的几个问题》，载《南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25页。

④ 赵丽、张秀芝：《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城市文化》，载《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第21页。

盲目攀比、漠视传统、人云亦云、缺少个性……^①就曲靖的城市文化发展现状而言也不容乐观。在物质文化层面，曲靖提出“雕塑之城”的城市建设构想，但其主题分散而不协调：《麒麟仙女》传递着远古神力的恩泽，《阿诗玛》书写着勇敢、爱情、不屈的赞歌，《诸葛亮与孟获》讲述着南中民族团结融合、奋斗不息的煌煌史诗，而位于大花桥新建的巨型雕塑《彩云之南》又充满了蓬勃昂扬的现代气息。先不说《阿诗玛》在石林地区的行政区划转移至昆明市之后早已“入赘邻家”，单《彩云之南》主题雕塑放在云南任何一个城市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昆明可以，大理可以，红河也可以，只要是彩云之南的城市都能当然地容纳它，几乎毫无城市特色可言。在行为文化层面，能够成为曲靖市独特文化行为的场所更是屈指可数，一样的公园，一样的广场，可谓“千城一面”。曲靖市也没有具有城市特色的行为文化，如特定的节日、纪念庆典、文艺活动等等。这样的活动即便有，也带有很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根本没有形成一种俗成的城市行为文化现象。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不仅不能感受到一座历史文化古城的居民所应有的精神气质，相反，中国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负面因素如人口素质低、人际关系冷漠而淡薄、个体精神孤独、强烈的被“物役”感等在不断侵蚀着它。曲靖城市文化发展方向又在何处呢？

爱默生曾说：“城市文化是靠历史记忆存在的。”事实上，许多学者都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城市背后所承载的深厚底蕴和历史记忆。“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越具个性特色，其存在价值就越大……历史与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永恒魅力。”^②“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文化无所不在，城市本身就是一件杰出的文化产品。”^③“城市的每一砖瓦，每一街巷都带有文化的印记；每一建筑，每一景观都是特定的文化品位的反映。”^④因此，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塑造城市的文化个性。例如拥有六朝古都

① 刘晓丽、张小河：《城市文化在现代城市建设中的作用》，载《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19页。

② 卞敏：《城市文化与地域文化》，载《阅江学刊》2011年第2期，第43页。

③ 陈柳钦：《城市文化：城市发展的内驱力》，载《西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8页。

④ 舒长根、蒋梅鑫、黄燕：《城市文化多元融合与民族文化保护》，载《城市问题》2004年第4期，第19页。

之称的南京，就利用其卓越的历史文化优势打出“岁月金陵”的标志，由南京市建设委员会出品、水晶石数字科技公司制作的宣传影像《岁月金陵》完美诠释了“三十万年的繁衍生息，二十五个世纪的深情眷顾”，“金陵古韵，往事千年，十朝旧事，风流云散，万古凭高，漫嗟荣辱”的历史沧桑与厚重，让世人感知着这座千年古城的从容与洒脱。然而，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加速，城市现代化节奏的加强，以及外来强势文化的入侵，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摆脱地域的、民族的历史局限。许多城市的历史印记已经开始渐渐模糊，并淡出人们的生活与认识。城市“往往会成为消解民族文化的主要场所。另一方面，城市发展又需要文化支撑，这是世界城市发展历史提供的宝贵经验，当代城市建设尤为如此”^①。因此，我们更要突出曲靖本土的民族文化历史特色在曲靖市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曲靖有“二爨之乡”的美誉，正是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发掘出了“二爨碑”、孕育出南中文明史上光彩夺目的“爨文化”。自公元三世纪到公元七世纪，曲靖是数百年南中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六朝时期珍贵遗存的“爨碑”，更以其无可替代的文化艺术价值昭示着曲靖城市文化发掘的新方向。“云南城市文化研究，就是要挖掘云南城市文化的各种资源，打造云南城市品牌，从而推动云南城市发展和提高云南城市竞争力。在这个理念引导下，云南城市文化研究要力争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②那么，“爨碑”的独特魅力又在哪里呢？

二、“爨碑”文化艺术内涵

众所周知，“爨碑”是立于东晋的《爨宝子碑》和立于刘宋的《爨龙颜碑》两通碑刻，也称为“二爨”，或“二爨碑”。历来对于“二爨碑”的研究大多侧重其书法艺术方面。诚然，“二爨碑”为世人所熟知、称道并引为“神品”，离不开其得天独厚、举世无双的书法艺术魅力，但是“二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所承载的文化艺术特征远非仅此而已。笔

^① 张永刚、马继明：《云南城市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与风格理念》，载《思想战线》2011年第1期，第125页。

^② 张永刚、朱谷生、杨黔云：《云南城市文化研究：一种建构与设想》，载《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6页。

者大致从碑刻文献传统、人文历史佐证、文学艺术特征、书法艺术价值等四个方面来整体解析“爨碑”的文化艺术特征。

（一）碑刻文献传统

我国铭刻文字的“金石之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由于“金”和“石”都有不朽的特征，满足了先人对于留名千古的心理需要，从而产生了大量的金石文物。夏商周三代贵金，我们今天犹能看到的诸如毛公鼎铭文、利簋铭文、散氏盘铭文、何尊铭文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与“金”相比，“石”的特点更为明显：取材容易、制作方便、成本低廉。“碑”字，《说文解字》云“竖石也”。古时人们通过它的影子看时辰，用它拴牲畜，在丧葬中还有“引棺下葬”^①的作用。起初的碑不刻文字，也主要是实用的功能，西汉已经有把葬铭刻在石头上埋在墓前的丧葬习俗，到东汉时期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曹全碑》、《张迁碑》等已经是无字的“碑”和有字的“铭”的结合了。^②

东汉的“厚葬”习俗可谓已尽奢华，书法家崔寔为安葬父亲甚至倾家荡产。曹操基于统治的种种需要，于东汉建安十年攻灭袁谭后下令严禁厚葬立碑，史籍记载“……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③。此后，“禁碑令”成为魏晋南朝的通行政令。

禁碑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所出土的六朝时代碑刻文物的数量锐减。“二爨碑”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南中地区，与当时的政治情况关系甚切：“云南地处边疆，山高皇帝远，很多政令的执行是比较走样的……内地禁碑是为了遏止劳民伤财，有损国力。边土遥远，立碑之举，无损大局，只要名分奉朝廷为正朔，其他也就宽松。”^④

如今，在提及六朝至隋唐的南中历史时，“爨文化”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名字。公元339年前后，南中大姓之中的霍、孟两家火并同归于

① 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4页。

② 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页。

③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27页。

④ 杨修品：《论二爨碑中的年号及其书法艺术》，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第57页。

尽，于是爨氏一家独霸坐大。爨琛成为“开门诸侯，闭门为君”的南中地区实际统治者，虽历经东晋、南朝数百年的政权更迭兵燹之祸，爨氏始终奉中央王朝为正朔，南中地区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呈现出较为“繁荣稳定”的局面。四百余年之间，南中人民创造了在建筑、饮食、书法、服饰、民俗、歌舞在内的灿烂的“爨文化”。然而，当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时却发现有关南中的全面而系统的历史材料并不丰富，相关信息仅散见于《南中志》、《后汉书·西南夷书》、《南齐书·州郡志》、《唐书·南蛮传》等中原官修史籍中，当地真实原始的文献材料是相当匮乏的。“二爨”的出现，客观上继承了前代的金石传统，为研究当时西南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文献材料。

（二）人文历史佐证

史学界有所谓“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注重对历史材料尤其是出土文物等真切直观的历史材料的整理分析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二爨”碑刻的出土对研究爨统治时期各个方面均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佐证。

1. “二爨碑”揭示了我国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传统

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原逐渐形成了一个文明体系——华夏文明。华夏文明亦成为中华的象征。中国自古对于文化认同感很强烈，甚至高于血缘和道德。孔子曾经在评价管仲的时候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管仲对于华夏文明延续的重要作用。判定是否为“华夏”的标准几乎可以等同是否接受华夏文化。所谓“诸夏而夷狄者则夷狄之，夷狄而诸夏者则诸夏之”。

对于“二爨碑”所记载的文字信息，尽管很多学者至今对其是否属于中原文化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属于非中原文化，也有人认为它属于中原文化的变体^①，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其官方文字属于华夏文化范畴“汉字”文化体系，行文的语言模式与中原华夏传统的语言模式（文言）并无二致。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背景构成了同一民族体系——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心理基础。自汉武帝开拓西南边疆并在“西南夷”故地设置郡县受中央直接管辖开始，云南一带成为中国的合法领土这一事实早已是

^① 苟利波：《从曲靖历史文物古迹文化内涵看滇东区域文化发展的流变》，载《沧桑》2008年第2期，第56页。

不刊之论。

如前所述，华夏民族对于血缘的认同感不及对于文化的认同感，这就使得华夏文明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民族包容性。蛮夷戎狄“归化”的事件仅在先秦时代就已不绝于史。秦王朝是历史上公认的第一个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里的“多民族”已经为此后我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国制度奠定了民族形态基础。

“二爨碑”所处的时代是民族大融合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碑中记载的以爨氏为代表的南蛮民族与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一同与原先中原的汉族相互杂处融合。尽管在残酷的历史现实面前“匈奴民族、羯民族、氐民族几乎全部灭绝”^①湮没在滔滔的历史巨浪之下，但汲取了先进文明的南中民族却越发生机盎然，创造出辉煌灿烂的“爨文化”以及之后的南诏大理文化。中原农耕文明和西南部落文明相互冲击交汇，西南各民族与汉族一起成为缔造六朝时代华夏文明的力量。

2. “二爨碑”反映了西南地区六朝时期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

在这方面，《爨宝子碑》最具代表性。碑文记载的年号为“太亨四年”（公元405年），而在东晋历史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年号。六朝时期内乱频仍，政权更迭不断，谋朝篡叛之举不可胜数。东晋末年，桓玄僭越称帝，将东晋原先的年号“元兴”改成“太亨”。然而，不久之后桓玄政权被刘裕所灭，恢复了“元兴”这一年号。但是当时南中地区接到改元诏令后随即执行，这一改就是四年（很有可能实际上使用时间更长），而四年后的东晋年号早已是“义熙元年”了。这一事件传达了几个信息：第一，南中地区奉东晋“正朔”，在名义上服从中央的领导，接受中央的册封。“尽管在《爨龙颜碑》中记载爨龙颜身兼四职，但史籍中对其任的主要官职‘刺史’却了无记载……‘刺史’成为爨氏自我封授的官职并祖孙世袭……可视为后来元朝在云南实施土司制度之滥觞。”^②第二，南中统治者实际上是地方割据政权。如果像汉王朝那样所设的郡县直接由中央统辖，那么绝不可能出现连续使用数年“伪政权”年号而浑然不知的

^① 柏杨：《中国人史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1~322页。

^② 云南日报理论部：《云南日报文史哲丛书·云南文史博览》，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事情。“由此一端，可见东晋不惟不能统治南中，即互通消息都很少，以致奉晋朝正朔而不知‘太亨’年号……南中与晋隔阂，已至于此。”^①此外，我们从两块碑所记载的官职信息可以看出，当时尚带有“鬼主制”的原始部落民族特征的爨氏统治集团的汉化程度相当高。不仅是在诸如“府君”、“使君”的称谓上，就连墓碑的“前序后铭”的形制和文字书写情况也与汉碑如出一辙。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原文化已经深入到了云南腹地，成为边疆主体文化之源。

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爨统治时期政治上与中央王朝（东晋、南朝）关系较为疏远，而在民间的文化交流却从未中断。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爨氏之所以能够在复杂残酷的民族斗争中最终取得南中的统治权，不仅仅凭借绝对的军事实力，“爨氏凭借自身与中原文化的渊源优势而取胜，当不是无稽之谈”^②。

3. “二爨碑”反映了书法艺术在六朝时代低微的社会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都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书写者和刻石者。《爨龙颜碑》当中只提到碑文的撰稿人爨道庆与督制石碑的杜长子二人（龙颜碑中的“匠碑”二字，杨莼先生翻译为“督建碑石”^③，笔者认为合理的。杜长子以“府主簿”的身份不可能亲自刻碑），而这些信息在《爨宝子碑》中几乎完全没有。汉代著名文学家扬雄就曾说“书道小技，壮夫不为”，当今存世的众多汉魏时期的著名碑刻中都没有署款，“写几个字，是不值得留下姓名的。汉晋的许多书法家，并不像现在我们所想象的急功近利，为当书法家而奋斗，所以笔意静穆。……从没有为书法而书法的”^④。正如“书圣”王羲之在写《兰亭序》时，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要创作出一份举世无双的书法作品的动机。单就《兰亭序》说，它是为“修禊”仪式中“流觞曲水”即兴所赋诗集所写的序跋，更加不是什么刻意为之的“书法作品”。

① 方国瑜：《滇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页。

② 云南日报理论部：《云南日报文史哲丛书·云南文史博览》，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③ 杨莼：《三碑点校注译》，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④ 杨修品：《论二爨碑中的年号及其书法艺术》，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第58页。

唐代以后，由于科举制度和统治者对于书法艺术的偏好，书法艺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仕途上沽名钓誉的“敲门砖”，书法艺术的低位也水涨船高，很多碑刻才开始出现撰稿人和书写者的落款。在此之前，碑文题款的现象相当少见，这也是“二爨”书家至今莫衷一是的原因。

（三）文学艺术特征

文学的文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理论成果。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譎诳。”从文体的角度来讲，“二爨碑”碑文都属于“墓志铭”。然而，无论是《爨宝子碑》还是《爨龙颜碑》都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碑铭尚实、质朴、温润的文笔特征，逐渐呈现骈俪之气。“但作者立足于粉饰太平盛世，极力称誉爨龙颜之所谓功勋，不能不离开‘尚实’原则而一味以浮言、谀辞充塞，所以内容一无足观。”^①“二爨”墓志部分的骈化倾向很明显，并开始注重对仗、音韵、用典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传统对偶要求字数相等、句式一致、词性相当、结构相应、平仄相反、内容相关等。这是“四声说”提出、格律诗词成熟后才渐渐形成的“作对规范”，但我们已经可以在“二爨”碑文当中找到许多不成熟的对仗句。《爨宝子碑》有句“九皋唱于名响（乡），束帛集于闺庭”。在这里“唱”为去声，“集”为入声，同仄。“名响（乡）”与“闺庭”在意义上相应，平仄也相对，属于“平仄”对“平平”的形式。再如“山岳吐精，海诞曙（渚）光”。其中“山”与“海”词性相同，为表示自然景物事类的名词，平仄相反。而“吐精”和“曙（渚）光”虽然词义相应，但平仄相同。《爨龙颜碑》有这样的句子：“清源流而不滞，深根固而不倾。”“清源”在词义上与“深根”相应，音韵上都为平平。“流而不滞”与“固而不倾”就对得很好。又如“姻娅媾于公族，振纓蕃乎王室”。这句里的句尾“族”为入声字（仄）“室”也是入声字（仄），就不协调。

“二爨碑”文中多数语句句式整齐，骈散兼有，粗具“四六”风格。

^① 施政声：《大爨碑管窥》，载《曲靖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第77页。